

五蓮文史資料

第二輯



# 目 录

|                       |                 |                |
|-----------------------|-----------------|----------------|
| 斗<br>争<br>史<br>月<br>月 | 怀念张鼎丞同志         | 辛 玮(1)         |
|                       | 日新月异岁不同 激昂慷慨寄深情 |                |
|                       | ——追记在五莲县的往事片断   | 靳星五(12)        |
|                       | 艰苦的历程 峥嵘的岁月     |                |
| 人<br>物<br>春<br>秋      | 我在华东局粮草供应站工作的回忆 | 王家熹(22)        |
|                       | 战斗在滨北五莲山区的百十一师  | 曹乃鼎 潘振福(25)    |
| 教<br>育<br>史<br>话      | 范予遂传略           | 王新礼(38)        |
|                       | 回忆慈父范予遂         | 范志民(42)        |
|                       | 民主革命时期的刘子庄和丁冠英  | 李学增(48)        |
|                       | 忆先父秦辅卿          | 秦泗斌口述 子卯整理(51) |
| 五<br>莲<br>特<br>产      | 春风化雨育人才         |                |
|                       | ——滨北中学教育工作的片断回忆 | 张达干(54)        |
|                       | 街头小学的兴办和发展      | 单立端(66)        |
|                       | 张步云创办大榆林中学始末    | 詹其华(69)        |
| 我在大榆林中学读书的回忆          | 刘永泽(72)         |                |
| <b>· 五莲特产 ·</b>       |                 |                |
| 历<br>史<br>事<br>人      | 清末、民国时期五莲山区的柞蚕业 | 王康烈(82)        |
|                       | 张步云在叩官一带罪行录     | 刘永泽(88)        |
|                       | 记阎王团在王家大村的罪恶活动  | 王世华(103)       |

· 民 主 与 法 制 ·

|                        |                      |
|------------------------|----------------------|
| 苑克茂案件始末                | 秦孟禹(107)             |
| 五莲地区道会门考略              | 厉保津(124)             |
| 名胜古迹                   | 鞠明连(137)             |
| 九仙山                    | 仙山名士共千秋              |
| ——漫话张侗在九仙山             | 仙 桥(143)             |
| 霜潭赋                    | 〔清〕张侗石民著 王天佑译注(146)  |
| 敕建五莲山光明寺碑记(译文)         | 厉保津(162)             |
| 抗日战争时期在五莲山区流行的革命歌曲(八首) |                      |
| .....                  | 臧家琦搜集整理 张其信曲谱校勘(165) |
| 九仙山大佛 封二               | 靴石 封三                |
| 插页: 丁氏石祠及仰止坊           | 丁氏祠碑刻拓片三张(王学良供稿)     |
| 九仙山一隅                  |                      |
| 洗耳泉                    |                      |

# 怀念张鼎丞同志

辛 玮

人的一生，总有些难忘的经历，境虽迁而事萦怀。一九四八年我在中共中央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日常工作的张鼎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便是我在各方面深受教益的一段经历。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山东解放军继刘（伯承）、邓（小平）、陈（庚）、谢（富治）、陈（毅）、粟（裕）大军转入外线作战，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后，转入全面进攻，同时，西北、东北、华北解放军均取得巨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山东解放区成了牢固后方和强大的支前基地。十一月，华东局机关暨华东局党校进驻五莲县仁里区大茅庄及其周围村庄。

当时我任五莲县委书记。记得在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夕的一个万里雪飘、漫天皆白的日子里，一位骑兵到县委驻地王家口子送来张鼎丞同志的指示信。信中大意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每个中央局要确定一个实验县，以便进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指导工作的要求，华东局与滨北地委协商后决定五莲县为华东局实验县，希你们认真准备材料向华东局汇报。内容包括全县区划、人口、群众生活、工作历史与现状以及党组织、干部情况及存在问题等等。

我们接信后，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指示。大家对华东局决定，深感幸运和喜悦。一致反映：华东局领导同志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水平高。其中张鼎丞、曾山

同志是“二战”时期福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们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幸存者。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地工作，并分工准备汇报材料。

二月间，华东局对县委进行了调整充实。张鼎丞同志推荐了原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尹阿根（邢子陶）同志担任五莲实验县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委员为杜大公、李滋圃、徐敏山（县长）、张鲁东（副县长）、段颶、牟景途、曹明楼、纪涛等同志。同时，将华东局工作团一些同志与华东局党校学员共二百余人（主要为县级及县级以上干部）分配到五莲县工作。不少人分担了区、乡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原区、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副职。

不久，张鼎丞同志在县委驻地仁里村亲自主持了首次县委扩大会议。鼎丞同志首先阐明实验县的任务是根据任弼时同志一九四八年一月《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和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精神，运用解剖麻雀、总结经验的工作方法，及时指导面上的工作，从而达到转变作风的目的。这是培养干部的重要措施。然后由我和张鲁东同志汇报了五莲工作情况，其他同志作了补充。鼎丞同志认真听取汇报，有时作记录。由于我平时工作粗疏，对有些问题语焉不详，鼎丞同志寻根究底，毫不放松。他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我非常尴尬，愧悔自己工作不够深入具体，深受教育。然后，阿根同志提出了工作安排意见。最后，鼎丞同志要求以仁里区为基点区，仁里村为基点村，各区均要选择一个基点，二、三个副点，配备得力干部，把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早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

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从而推动了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发展。同时，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但是，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出现的“左”的倾向缺乏注意，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①。在“左”倾指导思想和平山县经验影响下，华东局连续召开了大鲁南、渤海、胶东等土地会议，错误地、不公正地批判了黎玉、景晓村、林浩等同志所谓“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富农路线”等“错误”②，从而对山东各级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不纯估计过分严重，形成了一股颇为广泛的“左”倾思潮，使华东局和若干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一样，在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了失误。

在实验县成立之前，当地组织对于如何开展基层整党的方针、方法问题，曾作过反复酝酿。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另一种则主张“另起炉灶”。由于在“左”倾思潮影响下，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对部分干部确实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估计过分严重，因而以主张后者者为多，少数主张前者。

我省许多地区土改有某些不彻底，干部有某些不纯，因而进行适当调整、完善是完全应当的。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和“三查三整”③中却走到了它的反面：单纯走贫雇农路线，将中农的土地打乱平分，侵犯了中农利益。同时，错误地认为许多基层干部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采取了斗争、打击和“搬石头”的做法，甚至产生了乱抓、乱打、逼死人的极端行为。党中央对此及时地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采

取坚决措施纠正“左”的倾向。华东局以五莲县作为实验县试点，派出大的工作团下乡。那时，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他为了改变原来土改复查中对基层干部产生的过“左”行为，提出“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对领导采取自上而下、对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教育批判斗争的方针，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改变当时“左”的情况。但在五莲实验县执行中表明，这仍是过“左”方针的继续。工作团进入五莲基层后，发动群众不实事求是地批判斗争基层干部，有的被作出不公正的处理，引起下面干部思想新的动荡，有的伸腿不干，少数组织陷入瘫痪。虽然那时也有些地方主要通过教育干部的方针，没有发生多少问题，如户部区牟景途同志领导的某些地方等。但全县总的来说，还是普遍受到了这一错误指导方针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局认识到“双管齐下”方针的不妥，及时将方针改变为对基层采取“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对基层干部采取“爱护、教育、团结、提高”的方针。但那时由于不少基层执行了“双管齐下”的方针，局面已开始产生混乱。

当时正处于我军粉碎国民党对我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在前段尖锐的对敌斗争和完成异常繁重的动员参军、支前、征粮等战争任务的过程中，领导在要求限时限刻完成的形势下，基层干部做了大量工作，领导上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作风。当时工作证明，他们忘我地为战争胜利而操劳和苦而无怨的精神是可贵的，大多数是好的，问题严重的仅是少数和个别的，对他们执行“双管齐下”的批判斗争是错误的。尽管执行这一方针时间很短，蒙受冤枉处理的基层干部只是极少数，但影响却很大，波及面很广，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此情况下，县、区领导干部间，也发生了意见分歧，遂向鼎丞同志反映，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鼎丞同志为了认真

贯彻华东局提出的对基层干部“爱护、教育、团结、提高”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正确方针，派出华东土改指挥部的魏岩等四同志去莒南县小坊前调查研究，那里六年换了十三批干部，平均一年两次，和“翻地瓜秧”一样，弄得矛盾重重，非常混乱。同时，鼎丞同志派他的夫人路凯和吕伊波等同志深入工作团了解不同意见。尤为感人的是，鼎丞同志亲自找仁里村被斗干部蓝保森谈心。此时，应我的请求，鼎丞同志到仁里他的住处（一幢地主宅房）同我进行了两个半天的谈话。

谈话开始，鼎丞同志诚恳表示要我敞开思想，有啥讲啥，不必顾虑。我先如实汇报了五莲山区人民在旧社会时的悲惨生活和光荣斗争历史，当我讲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震惊鲁东南的日照暴动北路军在五莲山区曾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时，鼎丞同志倏地站了起来，动情地说：“是啊！那时我正在苏区，当时《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刊载了日照暴动的消息，红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真兴奋啊！但是，这次暴动乃是王明‘左’倾盲动路线的产物，斗争是英勇的，教训是沉痛的。因为暴动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又远离苏区，就是有经验丰富的军事家来指挥，也不会引向胜利，很可惜啊！感情不能代替理智。高兴是阶级感情的自然流露，但革命者只有感情不够，还必须有理智，懂得马列主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挥暴动要有科学的头脑，要冷静周密地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要考虑到自身先天的弱点。这一点，我也有深刻教训，在闽西暴动初期，我和邓子恢同志也不善于准确估量敌我力量，一味硬拼，结果使刚刚发动起来的武装斗争遭受挫折。后来，毛主席率红四军两赴闽西，帮助我们严重打击了闽西反动势力，他反复教诲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亲自帮助我们

起草了土地革命的斗争纲领，使闽西的斗争局面打开了，并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巩固部分之一。毛主席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啊！”

鼎丞同志接着说：“我们要向贺昌同志学习，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六届三中全会后是党中央委员。他很重视县级工作，曾担任江西省兴国县县委书记，他培养了一批批的革命骨干。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如果工作做得出色，那将对全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在红军长征时，贺昌同志被留下与陈毅、项英同志一起坚持游击战争，不幸于一九三五年春在仁凤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而牺牲了，真令人痛心啊！”

鼎丞同志让我继续讲讲五莲县基层干部状况。我说：“五莲过去分别是日照、诸城的辖区<sup>④</sup>，在开辟工作时注意了挑选第一批积极分子，强调阶级觉悟、作风正派、关心群众等条件，多数人经得起考验，也有混进来的坏人或变坏的，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错误是教育和工作方法问题。”鼎丞同志又倏地站起来说：“这次失误我负主责，应赔礼道歉！”他那真诚的表情，催我泪下。我急忙站起来说：“我患得患失，没有勇气向领导反映情况，也要负责。”鼎丞同志摆了摆手说：“责任在我。你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同志是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的，相信你们今后能更稳妥地掌握政策。看来正确的方针只能是‘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和‘爱护、教育、团结、提高’的方针。”鼎丞同志确定了几条有力措施：马上召开县委会议，接着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通过检讨失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搞好团结。在这两次会议上，鼎丞同志以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坦荡磊落精神，作了恳切的自我批评。

六月三日，鼎丞同志亲自参加了仁里区委在娄古庄召开的区、乡、村三级干部大会，再次向入会的四百余名初级干部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大声地说：“我对不起大家！我

代表华东局向同志们赔礼道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今后再也不要斗自己的人了，再也不要‘翻地瓜秧’了！大家要捐弃前嫌，既要对受委屈的同志们恢复名誉，又要团结新的积极分子共事，还要对失误的工作团同志谅解。”接着，鼎丞同志介绍了鼓舞人心的战争形势，指出祖国辉煌的锦绣前程。由于鼎丞同志是福建人，讲话大家听不懂，主持会议的李滋圃同志做了“翻译”。鼎丞同志讲几句，滋圃同志就接着讲：“张司令说”、“张司令又说”。如此场面，使台上台下的气氛显得热烈、和谐，消除了前段工作中产生的阴云。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特别是鼎丞同志恳切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诲，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村干部说：“张司令是有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咱们这些小人物交心，可见共产党英明伟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一定要按照张司令的讲话去做，争取早日解放全国，努力建设好家乡。”

会后，鼎丞同志亲自起草了给各区委的一封信，介绍了娄古庄会议的内容，要求各区仿行，认真贯彻华东局的正确方针。此信由鼎丞同志和李滋圃及我三人具名。鼎丞同志对待下级干部的平等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此后，全县工作走上了健康前进的轨道。

不久，鼎丞同志在华东局召开的各大战略区负责人的会议上，总结了各地“左”倾错误的教训，提出了“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和对干部实行“爱护、教育、团结、提高”的正确方针，以便有效地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医治战争创伤，迎接中央要求的结束土改等各项任务。他还主持起草了文章，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使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事后，他多次提到：“不到一个月的‘双管齐下’，代价太大，教训很深，几个月才改变啊！”

由于措施及时得力，实验县工作在一度失误之后，迅速走上了正轨。与此同时，由于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劳力缺乏，加之阴雨连绵，许多农田荒涝，群众吃糠咽菜，生活十分困难。在倭古庄会议后，广大基层干部又振作起来。这种苦而无怨的革命精神，确实感人至深。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华东局号召全省人民“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动员组织生产互助组，要求“多上一车粪，多锄一遍地，多打一成粮”。鼎丞同志还主持制定了若干政策和措施，如及时锄草、灭虫；鼓励垦荒，谁种谁收，熟荒三年、生荒五年不缴纳公粮；利用房前屋后种菜，多种扫帚菜，拿出大部赠送给烈军属；提倡用野菜充饥等等。此外，降低脱产人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只发十二小两（主要是地瓜干和谷子），提倡自磨自食，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负担。有一次，一个干部向鼎丞同志反映“能否把供应标准提高一点？”鼎丞同志严肃地说：“勒紧裤腰带嘛！我们还有点粮食吃，想想群众吃什么！”

通过艰苦努力，支前的青壮年民工陆续回归，劳力增加了，灾情缓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焕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乡、村工作也趋于稳定。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东局机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转移到益都县闵家庄一带。此后，鼎丞同志继续关怀实验县的工作，经常用电报和写信指示工作，县委亦两次前往闵家庄汇报、请示工作。

从十月初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当时结束土改的基本任务，是要经过干部与雇贫农的自

觉，把过去在土改复查中的偏向和错误纠正过来，明确阶级观点，树立政策思想，贯彻群众路线，澄清历史上阶级阵营与政策掌握的混乱，调整人民内部关系，在党的正确土改原则下结束土改，完成以前尚未完成的评定阶级成份、调剂土地、确定地权等项任务，使它成为群众性的端正政策与加强团结的运动，以达消除生产顾虑、扫清生产障碍、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目的。

五莲县结束土改运动，从十月全面展开，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工作团撤离，使运动转向以参军为中心任务止，前后共四个半月，其中除过春节与动员归队半个月，共四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共完成评定阶级成份四百零二村，占全县村数百分之九十二点四；完成调剂土地，确定地权二百八十三村，占全县村数百分之六十五。同时全部与局部公开党支部二百六十六个（各占二分之一），县学训练了三千名以上区、乡、村干部，提拔脱产区干部一百七十八人，半脱产乡干部三百七十九人；经滨北地委调出脱产干部一百一十二人；发展新党员五百名，建立充实了八十五个乡支委会；较普遍地结合整顿了党支部和农会；恢复与部分发展了妇委会；贯彻了华东局关于“爱护、教育、团结、提高”的干部政策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工作路线，使全县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很大提高，党的素质加强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为迎接全国解放，华东局工作团干部陆续离开五莲县，分别奔赴新的岗位。尹阿根同志随军南下前，认真整理了五莲实验县工作总结；我调往滨北地委工作。同时，地委决定由五莲、蒙阴、高密三县各抽调一批干部，随军渡江。“接管天下”，组织起一套县级及相应区级的党政领导班子，由李滋圃同志带队南下。至此，华东局决定实验县工作胜利结束，五莲县委重归滨北地委领导，由赵

均平同志任书记，张鲁东同志任副书记，徐新任县长。

岁月倥偬，华东局五莲实验县的成立转瞬近四十年了。它虽存在仅仅一年，但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启迪和历史借鉴。

我们深深怀念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五莲实验县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张鼎丞同志。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热情诚恳，勇于自我批评；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及时修正失误；他始终不渝地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关心人民疾苦；他自己学而不厌，对人诲人不倦。他不仅在当年强烈感染、教诲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永远是人民学习的榜样。另外，二百多位从华东工作团及党校下去工作的县级以上干部和原地方干部，含辛茹苦，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不仅是个自我锻炼，而且对今后的地方干部也具有教育意义。

总之，华东局对五莲实验县和华东土改工作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的要求，是胜利完成了任务的。开始在纠“左”中产生的曲折，是由于缺乏经验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并及时发现纠正了，对全省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达到了“试点”的应有要求。

张鼎丞同志永垂不朽！

#### 注：

①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八十七至八十八页。

②见中共山东省委（1986）8号文件《关于中央同意对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报告撤销华东局扩大会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克服党内无纪

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等同志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政治名誉。

③“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即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④当时莒县、莒北部分区划尚未划归五莲县。

# 日新月异岁不同 激昂慷慨寄深情

——追记在五莲县的往事片断

靳 星 五

## 一、历史的情感

洪凝镇，现在是中共五莲县委、县人大、县府、县政协等机关驻地。这个地方，在我童年的心灵中，就产生了一种特殊 的兴趣和感情。我原籍是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上华庄，环村皆崇山峻岭，抗日战争前到处是柞（栎）树林，我的祖辈很多人是放养柞蚕的能手，年年放养柞蚕，收柞茧。但是，很少自留柞蚕种，多半是到洪凝镇选购柞蚕种，因为品种优良，柞茧丝质品位高，有的贩卖这种蚕种，有的买回去以后，左邻右舍分购放养。当年我家有几处柞树林，我的祖父每年放养柞蚕，收获很多柞茧。从小看到家里人们用洪凝镇的柞蚕种，孵化幼蚕在柞树枝上放养，逐渐长大到吐丝做茧，柞茧象白色的鸡蛋，成千上万（以千为单位）地堆放起来，煞是好看。从而使我对放养柞蚕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觉得有浓厚趣味。饮水思源，因而对陌生的洪凝镇竟产生了莫明其妙的好感，而且形成了历史性的深厚好感。

五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来信，要我撰写关于战时中共华东局在五莲县或其它有关资料。接信后万感交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首先是我对五莲具有深厚感情，有历史上

的根源，所以，写了前面一段话。其次是还有现实的根源，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夏，我随山东省政府机关在五莲县的大茅庄住了几个月，一九四八年春，又在五莲县的范家车村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八四年又曾到五莲县旧地重游，感触更深，理应回忆撰写当时的经历及所见所闻，提供有关史料。再次是我参与省的文史和方志工作，对五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交付的这一光荣任务，盛情难却，义不容辞。虽然事隔四十年，记忆不全，手头又缺乏文献，撰写难度的确很大，然而总得勉为其难。当时我在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做秘书工作，那时省府的主要任务是战时后勤。因此，我打算着重就所接触的支前方面和有关事项，凭记忆所及，如实反映出来，聊供参考。如有误记和遗漏之处，尚望知情的同志们补充。

## 二、一九四七年前后的时代背影

为了便于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话得从头说起。鉴于当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变本加厉地反共反人民，接连制造特大残杀事件，如太河惨案、淄河惨案、雪野惨案等等，大量残酷杀害我党政军民干部，实属忍无可忍。一九四〇年秋，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先在临沂县青驼镇后在沂南县孙祖镇召开山东省各界联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简称战工会，推行战时行政工作，常驻鲁中、鲁南、滨海等行署区。一九四三年夏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改称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常驻滨海、鲁中南行署区。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改称山东省政府（简称省府），进驻山东省临时首府——临沂县城。是年冬，中共华东局和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上，驻临沂县城等地，中共华东局与中共山东分局合署办公。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悍

然后发动内战，打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第一枪，从此我们被迫进行自卫解放抗击。中共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等党政军民机关从临沂县城转移，先到临沂县城北茶山区、城西南册山区、城东北板泉崖区，尔后于一九四七年初经营县转沂水县城西北东山庄一带。同年五月间，连同省支前委员会一起，从沂水县的东山庄转移至五莲县的大茅庄一带。同年十月间，从五莲县的大茅庄奔驰在胶东大地上，从胶东的西海地区至北海地区、东海地区和南海地区，是年年底又反转过来，从南海地区、东海地区、北海地区至西海地区，又回到了五莲县的范家车村一带。在这期间，省府和省委支前委员会一直做支援前线的工作。

### 三、两次驻五莲

在本文第二部分里，说到一九四〇年山东建立全省性的政权——战工会，几经演变，改称行政委员会、省府。尽管名称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战时体制。前两者是在抗日战争，后者是在解放战争年代。虽然都是战时政权，我们还是抓工农业生产建设，抓民政、财政、文教、科技、医药等工作。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战时勤务工作，这是战争胜利的物质保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意味深长的。因此，要记叙当年的往事，不能不想到战时勤务工作，也就是支援前线，即支前工作。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想见其重要意义。

要写当年支前工作，很自然地想到对支前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郭子化同志。因此，对他先做个简要介绍。郭子化同志，是江苏省邳县人，北京朝阳大学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献身革命事业，自学成中医，战前在枣庄开业作掩护，为党做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山东分